

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

近日,由市中心医院中医一科主任吕旺编写的《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》再次出版发行,距首次出版发行仅仅过去了3个月。一部来自一线医生编写的医案如此叫好叫座,背后是作者的辛苦付出——

十年磨得丹方飘香

本报记者 刘伟



吕旺在沧州市第五届中医药论坛上发言

12年呕心沥血 证明中医不是“慢郎中”

年前,一部由吕旺编写的《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》引起了业界专家的关注,书中用作者12年8个月亲历的100个经典案例,详细真实地记录了中医药在心梗、脑出血、重症肺炎、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危急重症中的确切疗效。

这是一位中医,总结自己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呕心沥血之作,代表着我市中医研究的最新成果,更是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、国医大师李佃贵、全国名中医黄煌等业界知名人士的鼎力推荐。

尽管本书的价值得到了专家认可,但吕旺心里还是有些

忐忑:“出版的时候,出版社工作人员曾提醒,销售较好的医学书籍作者多是业界知名专家,其他作者的作品能否得到市场认可,还需时间验证。”

让吕旺没想到的是,3个月之后,《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》实现了二次出版发行。“这本书是我总结了数十年的临床经验,精选百例疑难危急重症,如实记录,详细解析,甚至是失败的、具有代表性案例,我也编入其中,希望能为中医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”

吕旺认为:“中医学有着2000多年历史,古代大医是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历练出来

的,常见病、多发病、疑难杂症、危急重症样样拿得起来。而目前,中医界涉及的往往都是常见病、多发病,疑难杂症较少,危急重症涉及得更多,至于疗效好、得到大家公认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不在危急重症方面打几场硬仗,是很难摘掉中医是“慢郎中”的帽子的。”

纵观中华文明史,中医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果璀璨夺目,从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到《本草纲目》等不胜枚举。有数据显示,清代之前,同时期欧洲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中国人短。这说明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中医对人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疗效是中医的根 也是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

医学史上,中医曾几次面临被废除的困境,但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一次次重新站了起来。无数次的临床实践,让吕旺一次次反思这样一个问题:中医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?

“是疗效,也只能是疗效。疗效是中医的根,也是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。没有疗效,中医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中医是一门实用科学,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,好不好都不会害人,中医是有效就有用、无效就有害。我认为这是中医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、并且在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的问

题。简单地说,只要能达到让病人满意、认可,中医必兴。”吕旺说。

“确保中医疗效最关键的前提,就是要坚持辩证地医治。这种治病的基本原则不会过时,而是正当其时。”这是吕旺临床实践过程中最深切的体会,“在我的诊疗过程中,无一不坚持这一原则,曾多次成功救治了急性心梗、脑出血、重症肺炎等重症病例。另外,对于肠粘连、肠梗阻这类病人,西医多采取手术治疗,然而手术本身就是一场创伤,可引起甚至加重粘

连,造成恶性循环。此病中医称之‘结胸’‘关格’,我自创一方六法,自拟通腑汤为主方,再配伍攻下、活血、理气、温通、益气、化饮,取得明显效果。”

坚持辩证地医治不仅是中医施治原则,也应在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中把握好这一原则,而不能简单机械地融合。“如果简单地将清热解毒药当作抗生素,将活血化瘀药当作血管扩张药来应用,只会落个‘邯郸学步’的结果。”吕旺说,这既是中医原则,也蕴含哲学智慧。

青县农民 搜集编写韩氏古今诗词

本报讯(记者祁凌霄)搜集18个省市当代诗人的作品,校勘上下数千年的诗歌名篇,自2022年初以来,青县农民韩中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联系全国的文化同道,主编《中华韩氏古今诗词选》,并在近期集结发行。

据了解,《中华韩氏古今诗词选》收录了古今174名诗人计5300多首作品。通过编辑书稿,在一

定程度上,促进了沧州诗词文化界与全国诗词文化界的交流联动。编辑过程中,韩中清搜集了秦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时期近百位韩氏诗人作品约20万字,然后分别打印寄送给全国范围的有关编辑人员,请他们根据权威出版物甄别校勘。校勘中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。78岁的退休编辑韩明华

老人,他在北京的家到首都图书馆坐公交车需要1个小时。一连许多天,老人早早起来就带着午饭去赶车。从上午图书馆开门到下午关门,他一直呆在那里对照典籍校勘已辑出的宋元明清诗稿,忘我工作的精神令人动容;75岁的河北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韩成武教授带病每天坚持工作七八个小时,进



几年前,韩中清在自家小院建起诗书阁

行唐朝和五代诗作的校对工作,将张冠李戴的作品和错字别字一一修正。

自2022年1月征稿启事发布后,有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贵州等18个省、市的诗人提供了当代诗稿,这些诗稿被审定后通过各种传媒平台陆续发表,促进了传统诗词阅读和写作,丰富了群众文化。

中西医殊途同归 应兼收并蓄各取所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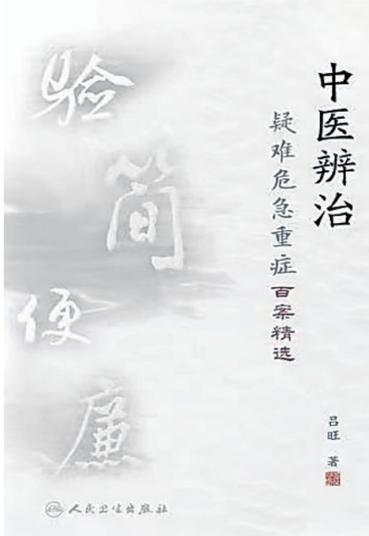
吕旺感慨,世间痛苦如此之多,只要能减轻病人痛苦,何必再有中西医的成见。更何况,理论和实践都已渐渐证明,中医西医同源,只是施治有所分别。

“从医学发展的本质上来讲,西医学同为治病救人而存在。二者同源,而又殊途同归,面对的是相同的病人,相同的症状、体征,相同的辅助检查,达到相同的目的——治愈疾病。只是方式不同,二者各有所长。”采访时,吕旺曾多次表明中西医应互相结合的思想。

“现在可以借助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,看到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。而早在民国时期,盐山大医张锡纯就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思想,并用他的毕生心血著成了中西医结合第一可法之书——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可见这本书有多高的学术价值。”吕旺认为,今天要传承的,不仅是张锡纯的医术,更要学习他在医学上不断开拓创新、包容并蓄的精神。

“中医讲究宏观辨证,西医擅长微观辨病;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收集资料,西医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标准化检测,各有所长。以中医为例,中医强调整体观念,提倡未病先防,这些都为现代医学更好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基础理论。西医借助微观体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,提高了整个现代医学的眼界。比如之前,中医认为不能服药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,而西医的静脉注射就解决了这一难题。疫情期间,国家倡导中西医结合共同施治,对疫情的防治和治疗起到了1+1>2的效果。”这也用事实再次证明了中西医结合是可行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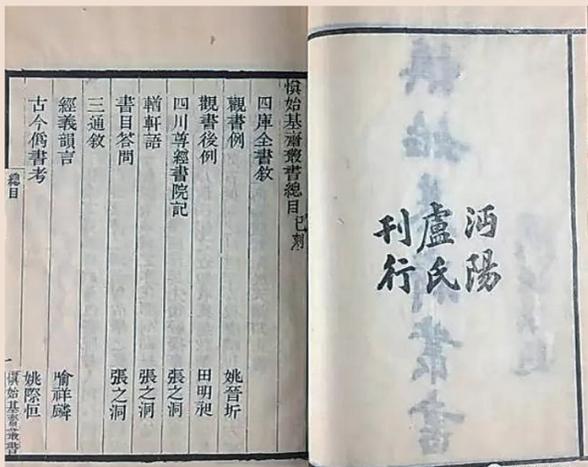
而吕旺所践行的,正是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自序中所说的: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,故学医者,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;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。一枝独秀不如春色满园,凭自己一人之力,穷极一生能治愈多少病人?只有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播出去,才能真正做到“济世活人”。



《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》书影

缪荃孙代张之洞撰 《书目答问》?

祁凌霄



《书目答问》收录张之洞三种著作

《书目答问》是继《四库全书》以后,清代学术的总结性著作,不仅开启了当时读书人的治学门径,也引导后来如梁启超、鲁迅、陈垣等一流学者走上深研传统的学术之路。1927年,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演讲时说:“倘要弄旧的呢,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去摸门径去。”

就是这样一本启发了数代读书人的名著,其作者为谁,在光绪末年,竟然陡起他说,在张之洞去世后,争论不已。甚至民国时如商务印书馆、上海朝记书庄出版的《书目答问》,直接改作者为缪荃孙(1844年—1919年)。

1914年12月,衡水枣强县藏书家贺葆真拜访长期辅佐张之洞在武昌日学的纪昶,归来后在《收愚斋日记》中叙述纪昶的谈话:“张文襄所著书,皆他人代为。”这句话被收录于2021年1月出版的《新辑治居剩稿》里。因是转述,贺葆真是否完整准确地记述了纪昶的原话?是否脱离当时语境?聊天的话能否作为严谨的书面结论?不得而知。《新辑治居剩稿》是沧州籍学者辑校,沧州读书界也有多人读过。作为张之洞的家乡人,读到贺葆真这句转述,疑窦丛生。

在贺葆真的转述中,纪昶虽没有提到《书目答问》,但过于绝对的话,当然也包括《书目答问》。1895年,叶德辉跋《书目答问》初印本云:听张之洞得意门生杨锐说,“此目”出自缪荃孙之手,“实非张之洞己书”。叶德辉跋语中所传证据,与贺葆真转述类似,同样令人怀疑,都不能作为推翻张之洞是作者的证据。

被认为代撰《书目答问》的缪荃孙在晚年自撰《艺风老人年谱》(记事截止到1911年)里载:光绪元年(1875年)8月,入张之洞门下受业,命撰《书目答问》;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,同治13年(1874年),为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“一手经理”“无一书不过目,无一字不自撰”,均称自己撰写了《书目答问》。后来此说经其学生柳诒徵等人沿袭,缪荃孙代撰《书目答问》的观点广为流布,至今未止。网络上有关词条、缪荃孙家乡及后人的研究文章,纷纷如是。

其实,缪荃孙代撰《书目答问》一辞,是缪荃孙晚年自道,含糊其辞,自相矛盾,站不住脚。

首先,缪荃孙在《半岩厂所见书目》序言中说:自己助理张之洞编著《书目答问》,并非代撰。这篇序言写于1908年前,早于自撰年谱,且张之洞此时尚未去世。同一人同一问题,前后抵牾,到底哪句是真?有人辩解,古代高官的著作,多由别人捉刀,张之洞是高官,所以他的著作也是别人捉刀,张之洞健在时,缪荃孙不敢直说。这种逻辑显然是不严谨的。

其次,金梁在《清史稿·校刻记》中说:“《土司传》为缪荃孙稿。”缪荃孙在《艺风堂随笔》中,也说自著《土司传》。对此,史学家方国瑜说:缪荃孙精于版本校勘之学,对边疆地理之学并不擅长,《清史稿》完成之前,缪荃孙已死,未必就是《土司传》作者,《艺风堂随笔》未必可信。方国瑜认为,《土司传》与《书目答问》的作者问题,同出一辙,缪荃孙在不同的著作里,前后不一,可见缪

氏有掠美之嫌。方国瑜还举出他在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处所见张之洞信札,以推翻缪荃孙自言代撰《书目答问》的说法。

陈垣,启功先生过恩师,被誉为“国宝”,与陈寅恪、钱穆、吕思勉一起,并称“史学四大家”。1936年,他在北京厂肆得到张之洞写给王懿荣的这封信札。王懿荣是张之洞妻兄,著名爱国学者,甲骨文发现者。这封信被收录在河北版、湖北版《张之洞全集》“光绪二年闰五月条”(1876年7月)亦有述评。信札大致内容是: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,在重庆写信就《书目答问》给王懿荣写信,自述编著此书的目和甘苦,并将书稿寄上两本,一本请王懿荣补正,一本请王转交在京的新进士缪荃孙,也请其补正。为摆脱自我炫耀的嫌疑,也可由王把书稿转给礼部右侍郎潘祖荫,请他指点一二。同时,寄在蜀中著述的《輶轩语》书稿,只让王自己一观,不必流传。

陈垣得此信札后,撰文甚详,一时遏制众流,“缪荃孙代撰《书目答问》”的说法便偃息。但事过数十年,或因地方主义、或因见识所限因袭旧说,这种说法又尘嚣直上,充斥网络和地方史料,令后人迷惑。其实,缪荃孙1876年中进士,没中之前在四川总督吴棠幕府中,助理张之洞编著《书目答问》;中进士后,又受托进行补正,襄赞之功并不在小。晚年自作年谱“掠人之美”,却大不应该。缪荃孙是学问大家,不是《书目答问》的作者,并不影响其学术成就。或许,“缪荃孙代撰《书目答问》”的说法更凸显了《书目答问》在中国学术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

最后,张之洞治学既反对当时琐碎的考据之学,又反对空疏的心性之学,主张学兼汉宋,注重致用,并放眼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,鼓励天下学子砥砺品行,关注实际,以图自强,救民族于危亡。带有鲜明的革新色彩。缪荃孙以版本目录学、史学等为主,在张之洞的影响下,也接受了部分近代思想并被张推荐开京师图书馆,为近代图书馆事业作出卓越贡献。但缪荃孙的学术,并未完全脱士大夫治学旧习,开放、革新的气度和见识,与张之洞不可同日而语。况且,在吴棠幕府中时,30来岁的他还基本是个循规蹈矩的旧学中人。《书目答问》开出大量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目,是张之洞号召天下学子放眼西方、实务救国理念的具体体现,对此,缪荃孙或赞同,但未必比张之洞强烈,从这个角度上,说他代撰《书目答问》,也是勉强的。

总之,《书目答问》是清代末期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,在教育、文化上的归结性和开拓性巨著,影响了数代学人;在当代,面对更加复杂的世界格局,如何继承传统、学习先进,依然是重大课题。张之洞说“世运之明晦,人才之盛衰,其表在政,其里在学。”这句话,至今都应引起足够的深思。